

# 西班牙於十六世紀的宗教氛圍

穆宏志<sup>1</sup>

## 前 言

西班牙，我們可簡稱為西國，於十五世紀結束時，抵達其關鍵時刻。由於葡萄牙的介入而導致在卡斯提亞的騷動與王位繼承的嚴重問題，促使卡斯提亞王后依麗莎白一世（Isabel I）的政權往前跨一大步。她與亞拉岡（Aragón）國王費南度（Fernando）的聯姻，形成一個聯合但不是統一的國家。這兩國的聯合，開始把伊斯蘭教於主曆第八世紀佔領伊比利半島以來所形成的不同領地，逐漸加以整合。位於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納達戰役（Granada）完成了國土的合併。納瓦拉（Navarra）在名義上還是獨立的，不久之後也被合併（1512 年）。伊比利半島尚有另一個生氣蓬勃的國家——葡萄牙——未被合併，不過這已超出了本文的範圍。

政治合一也帶來宗教合一，亦即：被勉強皈依，或被驅逐出境；這是我們今日不太可能允許的。有些作者說，宗教信仰好似成爲那時代的某種護照，或更像是身分證：隸屬某個國家，

---

<sup>1</sup> 本文作者：穆宏志神父，西班牙籍耶穌會士。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聖經學碩士、輔大神學院神學博士。現任教於輔仁聖博敏神學院，教授新約聖經、聖經希臘文、拉丁文等。

等同於皈依某個宗教，反之亦然：沒有人對此感到驚訝。不久之後，歐洲法律就出現這公認的原則：“*cuius regio eius et religio*”，即「該地區屬於誰，該地區的宗教也歸屬於誰」。

兩國的聯合也產生對外的影響。在傳統上，亞拉岡與地中海和義大利有關係，當時的義大利爲了半島南部的拿坡里—西西里（Napoles-Sicilia），正在結束與法國的對峙。卡斯提亞則剛剛發現西方的新土地，除了傳統上對北非的重視之外，新大陸的發現將完全改變其視野。費南度與依麗莎白這對天主教國王與王后（Reyes Católicos），試圖透過聯姻來鞏固其政權，與葡萄牙、英國、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o）結爲親家，其明顯豐碩的果實之一是表現在文化交流上。

除了上述提及的宗教合一之外，需要特別提出來的，是十五世紀末已經開始、且持續整個十六世紀的傳教士動力。起初，福傳的對象主要是向內的，即格城戰役之後仍住在附近的穆斯林。艾南度·塔瓦拉神父（Hernando de Talavera, 1428~1507）曾是皇后的前任告解神師，也是這地方的第一位總主教；他採用溫和的方式，但是效果不彰。繼任的西斯洛神父（Francisco Jiménez de Cisneros, 1436~1517）<sup>2</sup>採用較爲明快的方法而受到支持。

基於政治、文化、甚至宗教的原因，依據兩位國王的統治，本世紀可明顯地分爲兩個階段：卡羅斯一世（1517~1556；依據「日耳曼民族神聖羅馬帝國」的順序，他也被稱爲卡羅斯五世），及他的繼任

<sup>2</sup> Cisneros 是方濟各修會會士，依麗莎白女王的告解神師，後來成爲 Toledo 城的總主教，也參與西班牙政治，並推動西班牙文化。

者斐理伯二世 (Felipe II, 1556~1598)。不過，在卡羅斯一世抵達西班牙之前的時期，我們仍須稍作說明。

## 一、這世紀的最初幾年——西斯洛 (Cisneros) 的時代

### (一) 教會的改革

教會改革的呼聲——「從教宗到所有成員」(in capite et in membris)——於中世紀晚期已相當普遍。十六世紀初，教會之「元首」的改革更是絕對迫切，且特別影響到西班牙。當時在任的教宗——亞歷山大六世 (Alejandro VI)——是西班牙人，可說是「最需要改革」的一位教宗。

由於無法從西班牙推動教會「元首」的改革，至少可以從「成員」開始。在依麗莎白女王的時代，其告解神師塔瓦拉主教和主教們已著手推動。皇室與主教們的密切合作是相當重要的，不僅有助於教會的改革，也有助於王權的穩固。孟鐸撒樞機 (Mendoza) 是另一位支持以溫和方式來勸說的教會領導人，於 1478 年在塞維亞 (Sevilla) 所召開的大會中，詳細提出一系列的方法，後來在本世紀中葉的天主教改革中被接受。我們依據《教會歷史手冊》(Jedin<sup>3</sup>, 608)，提出下述的內容：

- ◇ 主教和其他受俸教士有義務在一年當中，至少在其住所住六個月。塔瓦拉神父瞭解這情況，因為在他成為主教

---

<sup>3</sup> Hubert Jedin, dir., 《教會歷史手冊》(*Manual de Historia de la Iglesia*) 第五冊，西文譯本：Barcelona: Herder, 1972 (本文簡稱 Jedin)。

之前，必須管理撒拉曼加（Salamanca）教區，而當地的主教則住在羅馬。他自己擔任格拉那達（Granada）總主教時，推動建立一個培育未來司鐸的機構。這兩方面是天主教會改革最有效能的牧靈方法。

德撒神父（Diego de Deza）除了是一位神學家和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也是傑出的牧者之一，在改革方面提供合作。在撒拉曼加，他曾主辦一次大會，與會者應包括本堂神父、副本堂司鐸、修道院院長、修會的監護人等。他擔任塞維亞總主教時，推動另一次大會，並再次堅持主日講道的重要性。

- ◇ 限制受俸教士的教宗委任聖職。因當時有不少教士受俸，卻與職務的履行完全無關，這項限制引起的抱怨，至少延伸到西歐所有的國家。
- ◇ 限制享受豁免特權的修會，且不把隱修院的院長職務交給教區的教士。
- ◇ 努力為本堂準備好的牧者，也會邀請受較多培育的外地司鐸巡迴到不同堂區開信仰的短期課程，以彌補教友們在信仰知識上的匱乏。

修會的改革也是重點之一，我們在此要介紹這時期的重要人物之一：方濟會的方濟各·西斯洛神父（Fray Francisco Jiménez de Cisneros，後來晉升樞機，原名為孔撒羅 Gonzalo）。塔瓦拉神父與孟鐸撒樞機商議之後，推薦他成為皇后的告解神師。由於他本人是方濟會卡斯提亞省的省會長，推動修會的改革是從他自己的修

會開始。當他在重整省會會院時，收到皇后諭令，遂承擔推動其他修會革新的職務，先從女隱修院開始，後來到所有的修會，至少包括所有的募緣修會（ordenes mendicantes）。他採用的方法不是柔軟與說服，而是果決有力，雖曾遇到困難，也有人高興地接納。總之，方濟會革新會院的數目相當多，當嚴規與緩規會院於 1517 年決定性地分開時，嚴規的重整會院數目比 1493 年的數目更多（這情況只限於西班牙）。

西斯洛神父好像未親自涉入其他修會的改革，儘管他有權這麼做。另一方面，那時期的改革也在本篤會士、熙篤會士、奧斯定會士、道明會士中間展開。毫無疑問地，他曾推動每一修會的改革，明智的方式不是涉入，而是鼓舞。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點，即在不同修會的改革歷史中，出現天主教國王（Reyes Católicos）的名字<sup>4</sup>。

方濟會的革新會院傾向遁世隱修和收心祈禱，也從這些會院產生向新世界福傳的熱忱傳教士。對這兩種傾向，後來會再多談一些。

---

<sup>4</sup> Ricardo García-Villoslada, 《天主教會歷史》（*Historia de la Iglesia Católica*），dirigida por Ricardo García Villoslada y Bernardino Llorca tomo III. Madrid: B.A.C., 1960, pp.607~616（本文簡稱 HIC GV o BLI）。

## (二) 近代虔誠運動 (Devotio moderna)<sup>5</sup>

近代虔誠運動並不是方濟會的靈修精神，不過，「由於它是  
以基督為中心，且看重情感勝於思辨，與方濟學派的聯繫比與  
道明學派更為直接」(HIC GV 552)。

當我們談到這世紀初的靈修氛圍時，經常會提到「近代虔  
誠運動」。一本教會歷史書介紹「這熱忱的靈修精神，無疑是一  
種被動的，聚焦在個人對基督深入效法……」(《教會新歷史》NHE  
40)<sup>6</sup>。稱這運動為「近代」，「是為與古代，即先前帶有思辨、  
經院特質的時代提出反動」(HIC GV 552)。它的基本特徵是實際  
的：「實際效法基督——祂的謙遜、祂的忍耐、祂的服從……」。  
與此相連的是「情感的特質。這種靈修運動的目標是要感受到  
靈修事物，尤其是內心的懺悔，更勝於理性的明瞭」(同上)。《師  
主篇》是近代虔誠運動的經典之作，至今整個時代都廣泛地用  
這本書。

這時期的西班牙，與蒙塞拉 (Montserrat) 隱修院院長加西亞·  
西斯洛神父 (García Jiménez de Cisneros) 有很深的聯繫。他是孔撒

<sup>5</sup> 譯註：Devotio moderna 可譯為「近代虔誠運動」或「現代靈修運  
動」，是十四世紀由荷蘭平信徒所發起，後來也包括聖職人員的  
熱心靈修運動。此運動尋求經由固定的默想與祈禱，使心靈更接  
近天主，而在生活中節制私欲偏情，強調宗教體驗勝於系統神學  
的反省。參：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著，《神學詞語彙編》(台北：  
光啓文化，2005)，278 頁。

<sup>6</sup> L. J. Rogier, R. Aubert, M. D Knowles, 《教會新歷史》(Nouvelle  
Histoire de l'Église), vol 3.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68 (本文簡稱  
NHE)。

羅·西斯洛樞機的弟弟（Jedin 609 則說是他的侄兒）。自從他被任命為副院長（1493）和院長（1499），就開始推動隱院的改革，且與在瓦亞多利城（Valladolid）已經重整的 San Benito el Real 隱院合併，後者是他於 1475 年開始度隱修生活的地方。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在擔任隱院院長期間，寫了一本《操練》（*Ejercitatorio*）的靈修小書。傳統上認為，這本書影響了依納爵對《神操》的編輯。

### （三）伊拉斯穆斯主義（Erasmism）

許多作者肯定，伊拉斯穆斯（Erasmus, 1466/49~1536）認識「近代虔誠運動」，而且他自己也用過這個方法：也有作者迴避，視為不恰當的資料。毫無疑問的是：他認為應更內在化而較少世俗化的宗教概念，的確與近代虔誠運動有某種相似性。

關於伊拉斯穆斯在西班牙的影響，在提及卡羅斯五世的時代再談。關於這時期，我們只須提到，西斯洛樞機曾邀請他到亞卡拉（Alcalá）大學教書，在聖經多種語言版本的研究方面合作，但他以「我不喜歡西班牙」的藉口婉拒了，誠如他在給托馬斯·摩爾（Tomás Moro, 1478~1535）的信中所寫的。

### （四）人文主義（Humanism）

文藝復興運動的人文思想正進入西班牙，我們再次看到西斯洛樞機的角色。他創立亞卡拉（Alcalá）大學和推動多種語言

版本對照的聖經<sup>7</sup>，即是兩個很好的例子。多語言對照版聖經於1520年出版，可是新約的希臘文首版早在1516或1514年已準備好（雖然伊拉斯穆斯的版本更早一些出版，只是為等待舊約的對照版本也備妥）。

### （五）教會向美洲開放的計畫

歷史學者胡托馬（Hugh Thomas, 57頁）<sup>8</sup>曾狡黠地寫到：「基督信仰從起初就參與對印地安人的征服。十字架是征服的象徵，也是皈依的象徵」。他還加上：

「哥倫布在第二次航行時帶了司鐸們，他們也陪伴了大部分印地安人的征服者。1512年，有兩位主教在聖多明尼加（Santo Domingo），另一位在波多黎各（Puerto Rico）；同時，方濟會士蓋貝德（Juan de Quevedo, 1450~1519）也毫不遲疑地於1513年接受巴拿馬達安（Darién）教區的主教任命……。某方面來說，西班牙征服者好像從伊斯蘭教徒手中收復西班牙領土的繼承者，又為基督信仰贏得新的土地。」（同上）

<sup>7</sup> 譯註：The Complutensian Polyglot Bible 是第一本以多種語言印出的聖經，由西斯洛樞機推動和資助、Complutense 大學印刷出版，內容包括首版的新約希臘文、完整的七十賢士譯本及東方正式的阿拉美文妥拉譯本：Targum Onkelos。

[http://en.wikipedia.org/wiki/Targum\\_Onkelos](http://en.wikipedia.org/wiki/Targum_Onkelos)

<sup>8</sup> Hugh Thomas, 《卡羅斯五世的西班牙帝國》（*El Imperio español de Carlos V*），Barcelona: Editorial Planeta, 2010（本文簡稱「胡托馬」）。



## 二、卡羅斯一世的統治（1517~1556年）

### （一）國王帶著隨從抵達西班牙，並引發初期的不悅

#### 1. 西班牙的卡羅斯一世

卡羅斯於 1517 年首次抵達西班牙，即他的外祖父費南度去世一年多之後，正適時地繼承西班牙的所有小國，首次合併歸屬於一個人來管轄。他在十七年前生於荷蘭的Gante<sup>9</sup>，抵達西班牙時，完全不懂西班牙文，被一群講荷蘭語的宮廷人士包圍，他也賞給他們分封酬庸，使西班牙卡斯提亞（Castilian）的貴族們感到不悅。

卡羅斯的教育，主要是由他的姑媽瑪格利特（Margarita of Austria）監管；她嫁給卡羅斯的舅舅——王子若望，是這些王國的繼承人，可惜他早逝。瑪格利特在歐洲皇族中擁有才智的美名，找到阿德里安（Adrian of Utrecht）來當卡羅斯的老師。他是魯汶聖伯鐸主教座堂的總鐸長，也是共同生活兄弟會虔誠團體（Brethren of Common Life）<sup>10</sup>的成員。另一位同樣對卡羅斯有影響力的是Monsieur de Chièvres，這位嚴格的老師確保卡羅斯早年

---

<sup>9</sup> 譯註：Gante 是中世紀歐洲大城之一，是比利時的第二大港和紡織工業的中心。

<sup>10</sup> 共同生活兄弟會（The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拉丁文 *Fratres Vitae Communis*，簡稱 FVC），由 Gerard Groote 在十四世紀所創立的修道生活團體，成員是羅馬天主教的司鐸，在教育方面有卓越的成就，有深刻的宗教經驗，且宣揚耶穌基督之單純虔誠的生活。[http://en.wikipedia.org/wiki/Brethren\\_of\\_the\\_Common\\_Life](http://en.wikipedia.org/wiki/Brethren_of_the_Common_Life)

認真地讀書（胡托馬，29s）。

## 2. 德國的卡爾五世 (Karl V)

1519 年，他的祖父——神聖羅馬日耳曼帝國的皇帝馬西蒙一世 (Maximilian I) ——辭世，他選擇繼承其王位，這使他得離開西班牙，懸缺期間，則委請他的老師阿德里安當攝政王，而他的老師不久之後，就成為教宗阿德里亞努斯六世 (Adrianus VI, 1522~1523)。卡羅斯不在西班牙境內，加上返國的旅費及為確保選舉所需的費用，又從人民稅收中支付，更加深了民怨，後來導致在中部的卡斯提亞與東部濱海的瓦倫西亞有人民反抗暴動，與法國交戰，而法軍入侵北部的納瓦拉 (Navarra)，情勢更是火上加油。到了 1523 年底，一切終於恢復平靜，人民開始逐漸認同國王的理想。

### (二) 人文主義的延續

卡羅斯第一次到西班牙時，是被外國的人文主義者所包圍，例如他的老師阿德里安，及日後成為大臣的 Gattinara 等。1520 年 10 月，他在 Aix-la-Chapelle/Aquisgran 被加冕為國王，而第二次再回到西班牙時，都是熱衷人文主義的西班牙人陪在他身邊，其中最醒目的，首推人文主義王子，即荷蘭鹿特丹的伊拉斯穆斯（胡托馬 42）。在服事國王的人中，有一位行政書記官亞豐索·巴爾德 (Alfonso de Valdés, 1490~1532)，他很快就成為國王的秘書。他與其雙胞胎的兄弟若望 (Juan de Valdés)，日後在西班牙文學上享有盛名。另一位響亮的名字是日後宗教裁判所的

審判官曼黎加 (Alonso Manrique de Lara)，他也出席了加冕典禮。還有當時最負盛名的西班牙人文主義者彼路易 (Luis Vives, 1492~1540)，他是伊拉斯穆斯的朋友，被稱為「現代心理學之父」，大都不住在西班牙，其所有著作都以古典拉丁文出版。當然，這點並未減損他在人文主義圈的影響。

人文主義的中心還是在亞卡拉 (Alcalá de Henares) 和其大學。相較之下，亞卡拉比較現代，較具有人文主義精神；撒拉曼加 (Salamanca) 則比較傳統，較有神學特質 (傳記 26)<sup>11</sup>。

1525 年，當依尼高·羅耀拉 (Íñigo de Loyola, 依納爵的原名) 來到亞卡拉時，García Villoslada 描述當地的氣氛，提到：

「亞卡拉的氛圍和依尼高之前所碰到的迥異。他不知道他掉進一個怎樣充滿新思維的熊熊火爐裡：科學的創新、人文主義、伊拉斯穆斯主義、光覺主義 (alumbradism)，還有更重要的，就是靈性的更新。亞卡拉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典型大學，這是樞機西斯洛從頭到尾的功勞，沒有中世紀的傳統……對所有歐洲的思潮開放——除了異端以外，為了能提供教會更大的服務，創辦人希望推動當代文學、哲學和人文主義的趨勢，並予哲學和神學領域有充分批判和趨勢的自由，以及科學和靈性領域。」 (傳記 272)

我大量引用，因為我認為作者對亞卡拉的描述，也可適用

---

<sup>11</sup> Ricardo García-Villoslada, 《聖依納爵·羅耀拉，新自傳》 (*San Ignacio de Loyola. Nueva Biografía*), Madrid: B.A.C., 1986 (本文簡稱「傳記」)。

於卡羅斯國王在本世紀前幾年的西班牙狀況。

上述觸及兩個我們要立即深入的主題：伊拉斯穆斯主義與光覺主義。但在結束這段之前，還可講一個文學典故，就是發生在格拉納達城的對話。威尼斯大使納瓦洛（Andrea Navagero）鼓勵其好友波斯甘（Juan Boscán），把義大利的某些詩的格式用在西班牙詩中。他嘗試了，但不受好評；其好友——也是西班牙最好的詩人之一賈貝加（Garcilaso de la Vega, 1498-1536）——卻大為成功。他第一次用五行詩，其中包括七和十一音節的詩句組合，稱為「里拉」（lira：他在這段落的第一行用的字）。路易·里昂神父（Fray Luis de León, 1527-1591）<sup>12</sup>用這種詩的格式寫宗教詩，而聖十字若望用來寫其「心靈之歌」（Cántico espiritual）。

儘管國王周圍都是人文主義者，他自己受教於他的老師，也勸自己的兒子斐里伯（Felipe）要好好學拉丁文，可是他個人的拉丁文從來就沒學好過。若有人用拉丁文跟他說話而他聽不懂，他就答道：「這個人以為我是費南度（Fernando）！」意指他的外祖父亞拉岡的費南度（Fernando de Aragón：參胡托馬 35）。

當人文主義思想在西班牙擴展時，一個令人好奇與注意的事是：

「吉洛加（Vasco de Quiroga, 1470-1565），墨西哥Michoacan 教區的主教，仍堅持採用托馬斯·摩爾的『烏托邦』（Utopia）

<sup>12</sup> 路易·里昂神父（Fray Luis de León, 1527-1591）是西班牙的散文詩人、奧思定會的神父和神學家，於西班牙的黃金時期在學術方面相當活躍。[http://en.wikipedia.org/wiki/Luis\\_de\\_Le%C3%B3n](http://en.wikipedia.org/wiki/Luis_de_Le%C3%B3n)

爲其施政準則……。他首次讀到摩爾的烏托邦，是在哲學家Luciano以對話方式表達的一段敘述，摩爾在伊拉斯穆斯協助下翻譯出來。這使他認爲，居在『新西班牙』<sup>13</sup>的單純老百姓，可以在『黃金年代』仍維持在無知的狀態來生活。因此，在新世界推動文明的任務，不宜把舊文化移植到新發現的民族身上，而應以初期基督信仰的原則來提升他們，摩爾的『烏托邦』是這種提升的工具。」（胡托馬 494）

### （三）伊拉斯穆斯主義的蓬勃發展

西班牙爲數衆多的人文主義者，都是鹿特丹的伊拉斯穆斯的追隨者，也獲得卡羅斯一世的宮廷支持。伊拉斯穆斯送給皇帝其著作《基督徒王子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拉丁文是 *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他的追隨者包括高階行政大臣 Mercurio Arborio Gattinara，其書記官亞豐索·巴爾德（Alfonso de Valdés），還有一些天主教聖統制的人員，例如 Toledo 總主教 Alonso de Fonseca，和宗教裁判所審判官 Alfonso Manrique de Lara，兩人都是伊拉斯穆斯主義者。

可想而知，1526年，當伊拉斯穆斯的著作《基督徒騎士手冊》（*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 The Manual of the Christian Knight*）被譯成西班牙文出版時，得到熱烈的迴響。本書的譯者在1527年寫

---

<sup>13</sup> 譯註：「新西班牙」（Nueva España）是墨西哥於1821年獨立之前的正式名稱，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的國王即「新西班牙」的國王。[http://en.wikipedia.org/wiki/Nueva\\_Espa%C3%B1a](http://en.wikipedia.org/wiki/Nueva_Espa%C3%B1a)

給伊拉斯穆斯的信中說道：「那些從前未聽過伊拉斯穆斯名字的人，現在因這本書得知他的存在」。他的其他著作也同樣大受歡迎，有些人文主義者，其中包括著名的 Juan de Vergara，也前往荷蘭為受教於他門下。

在本世紀的初期，出現了《新約》的一個新版本，於 1516 年受到隱修院院長 García de Bobadilla 的推薦，在西班牙大受歡迎的程度，連伊拉斯穆斯都感到驚訝，以致在 1524 年，他對於先前未接受西斯洛樞機邀請之事，感到懊悔。

依照 Joseph Pérez 的說法，伊拉斯穆斯除了其人文主義的名望之外，吸引西班牙人文主義菁英的原因是他的宗教理念：

「面對羅馬，伊拉斯穆斯堅持教會和宗教改革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以及去除教條和形式主義層面之必要，包括過度的神學思辨和幾近迷信的行禮如儀。伊拉斯穆斯捍衛回歸福音、返回一種靈修的宗教和內在的敬拜。面對路德，他捍衛人的自由意志，努力維護基督宗教世界的統一。他的理想，是一種沒有戰勝者與被戰勝者的和解，既肯定教會所需要的改革，又能避免分裂。<sup>14</sup>」

大家都知道，這種中立立場的結果，既激怒了路德（Jedin 219-228），也未能討好天主教會，我們馬上就會看到。

#### （四）撒拉曼加 vs. 亞卡拉，或神學家 vs. 人文主義者

伊拉斯穆斯的觀點和路德近似，尤其是我們所謂的生活紀

<sup>14</sup> 引自 *Erasmismo en España*: [es.wikipedia.org/Erasmismo\\_en\\_España](http://es.wikipedia.org/Erasmismo_en_España)

律而不是教理層面，加上某些知名的伊拉斯穆斯主義者與出現在西班牙的路德派人士來往，使他失去大眾的好感，甚至影響到皇帝。1527年：

「由宗教裁判所審判官，也是塞維亞（Sevilla）的總主教曼黎加（Alonso Manrique de Lara）所召開，召請當時最富盛名的西班牙神學家們在瓦亞多利城（Valladolid）的聚會，目的是為了檢視、討論和宣佈有關伊拉斯穆斯之正統性或異端性的命令。面對放肆和大膽的人文主義，在知識份子和皇帝宮殿中都逐漸獲得許多追隨者：老士林神學不可避免地要起來反對，其重要代表大都是修會會士。我們知道，『托鉢會士』（mendicant friars）是最老的士林神學家，對伊拉斯穆斯也最懷有敵意；比較不那麼苛刻的是本篤會士、熙篤會士和熱羅尼莫會士。對伊拉斯穆斯最友善的論斷，是來自比較新的亞卡拉大學的神學家，除了一個以外……；最尖銳嚴厲的批判，是來自撒拉曼加的神學家 Francisco de Vitoria<sup>15</sup>，他在嚴格的批評中展現其明智、諒解與平衡……」（傳記 293~294）

最令人害怕或期待的譴責，並未發生，因為聚會的主席和審判長曼黎加——他本身也是伊拉斯穆斯主義者——以瘟疫對城

---

<sup>15</sup> Francisco de Vitoria 是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的天主教哲學家、神學家和法學家，是撒拉曼加哲學學派的創始人，其特殊貢獻是在正義之戰與國際法的理論。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ncisco\\_de\\_Vitoria](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ncisco_de_Vitoria)

市造成威脅為藉口而將會議解散。幾年後，他從宗教裁判所審判官的職位退下來，情勢就大為不同了。撒拉曼加和其神學家們贏得勝利。事實上，雙方的不信任由來已久。當 Nebrija 不再投身於古經著作和西班牙文法，轉而批判性地研究《新約》的經文時，就開始與教會的聖統制有了困難。

宗教裁判所的建立，本來是為瞭監測皈依的猶太人和穆斯林，避免他們再次跌倒的危險，而今找到另一個行動的新領域，即面對伊拉斯穆斯主義的可疑份子、路德主義者和光覺主義者。這期間發生一件事，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當時在西班牙的氛圍：

依尼高·羅耀拉於 1527 年夏天來到撒拉曼加，當時正舉行有關伊拉斯穆斯的會議。按照他的習慣，他與人們談論靈性的事，引起聖斯德望修院道明會士的注意。他們邀請他共進晚餐，然後問他很多問題。到某一時刻，依尼高對於談話的氣氛感到不太對勁而拒絕回答，此時我們聽到有趣的插話：「會士催道：『現在有這麼多伊拉斯穆斯的謬誤，還有其他這麼多人在欺騙世界，你不想解釋你所說的話？』」（自傳 65）<sup>16</sup>

### （五）近代虔誠運動的持續發展

近代虔誠運動引進了一種新的宗教形式，其廣泛拓展的程

---

<sup>16</sup> San Ignacio de Loyola, 《自傳》（*Autobiografía*）, n. 65 在 *Obras Completas de S. Ignacio de Loyola*, Madrid: B.A.C., 1963（本文簡稱「自傳」）。



度，可從《師主篇》這本書的流傳看得出來。《靈修辭典》(DS vol. III col. 729)<sup>17</sup>將這本書的作者歸於耿稗思(Thomas a Kempis)，持續的基本關注是內在的生活與不同形式的默想(同上，743)。

於此同時，苦修會的會士魯道夫(Carthusian Ludolfo of Saxony, 1295~1378)所著的《基督生平》(*Vita Christi*)有時也與這靈修運動連在一起。這本書被方濟會士詩人 Ambrosio de Montesino (1444~1514)譯成西班牙文，在西班牙廣受歡迎。作者在書中教導一種吸收經文的方法，包括：閱讀(lectio)、默想(meditatio)、祈禱(oratio)，鼓勵人想像福音事件發生的場景，並試著進入此場景中……(DS IX 1136)。我們想到依納爵·羅耀拉在一座城堡中養傷，居然找不到一本騎士小說(自傳5)，反而在自家內找到《基督生平》與《聖人行傳》(*Flos Sanctorum*)，可見這家庭女主人的影響，也使我们看出在修道院和大學之外，所瀰漫的宗教氛圍。

## (六) 宗教的偏差：光覺派

基於靈修上的關注，產生了所謂的「光覺派」，其中可能伴隨著某些非必要的宗教因素。「光覺派是那時充滿靈性活力下的一種不成熟的果實，於十六世紀湧入西班牙，正值國家意識萌芽的時刻，人們遂認同一種宗教理想，以推動教會團體與個人在靈性上的革新」(DS VIIIb col 1382)。

---

<sup>17</sup>《靈修辭典》(*Dictionnaire de Spiritualité*), Paris: Beauchesne Éditions, 1928~2005 (本文簡稱 DS)。

由於光覺派的著作全都被銷毀，我們沒有直接的文件，只能透過對他們的審判記錄或被審判時的答覆來描述，可以突顯下列幾個因素：

1. 心禱的重要性：這是靈修生活的最大秘密及關注點。此運動對方法興趣盎然。
2. 熱衷神秘現象：出神狀態、神魂超拔、神見、內在話語……等，非常注意這些外在現象，甚至把它當作聖潔的標記或準繩。
3. 運動的不同傾向——被光照、自我捨棄、收斂心神、神視者……等——都與祈禱有關。

上述是主要的偏差。靈修作者在談及祈禱、默觀、克苦或操練德行時，常警告人們規避上述的危險。「西班牙十六世紀的靈修導師尋找成全之道與途徑，在其著作中，也相當自由地教導，其著作傾向提供成聖的有效方法。就這意義而言，歐素納（Osuna）、拉瑞多（Laredo）、甚至聖女大德蘭均能被稱為光覺者」（同上 1383）。另有些作者未敏銳辨別導致岔路的危險，而正是這些人給光覺派冠上壞名聲。

宗教裁判所在 1525、1574、1578、1623 頒布了多項反對光覺派的諭令，資料全出自對他們的調查和審問，比較不容易瞭解在初期直到第一個法令之前，光覺派運動拓展的範圍與內容。與伊斯拉謨主義的某些人一樣，光覺派的某些小團體與伊比利半島早期的基督新教人士保持接觸。

## (七) 持續改革與更新熱火——修會

修會改革結出豐碩的果實，可以從這時代豐富的宗教文學得到證實。通常這些作品饒富文學價值，很自然地被收錄在文學史中。

### 1. 方濟會士

在這段時期，他們的著作最為多產，我們舉出兩位為例：拉瑞多修士 (Fray Bernardino de Laredo, 1482~1540) 及歐素納修士 (Fray Francisco de Osuna, 1492~1540)。

拉瑞多 (Laredo) 雖從未晉鐸，但「留給我們一本《攀登熙雍山》(Subida al Monte Sión)，書中充滿了光明、恩寵和甜美，內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談論五官的淨化、認識自己、默想等；第二部分論及基督與瑪利亞生平的奧蹟；第三部分完全探討默觀」<sup>18</sup>。這本書的書名和內容，為十字若望的《攀登加爾默羅山》(Subida al Monte Carmelo) 揭開序幕，好像也影響了聖女大德蘭。「本書再版時，刪除了一個關於愛人的靈魂好像變大了的道理，以及某些說法，如：『純精神』、『願天主光照我們』，因為這些措詞讓人懷疑是否有伊拉斯穆斯主義或光覺派的味道」<sup>19</sup>。

歐素納 (Osuna) 留給我們一本按字母排序的靈修著作，於

---

<sup>18</sup> Antonio Royo Marín, OP, *Los grandes maestros de la vida espiritual*. Madrid: B.A.C., 1990, pp. 303~304.

<http://franciscanos.org/enciclopedia/bernardinolaredo.htm>

<sup>19</sup> Melquiades Andrés, *La Teología española en el siglo XVI*. T. II. Madrid, BAC (maior 14), 1977, pp. 214~218 (同上)。

1527年出版的《第三部靈修入門》(*Tercer Abecedario Espiritual*)。「面對當時很普遍的光覺者的教導，歐素納在其作品中捍衛關於收斂心神的健全道理。他的文學創作力非常卓越，在1528年11月到1531年，就至少出版了五本西班牙文書……」<sup>20</sup>。「他有很大的貢獻，因為是第一位以西班牙文撰寫密契的作者，把已準備好的語言留給加爾默羅密契家的作品，他可謂是他們的前驅與老師」<sup>21</sup>。

## 2. 奧斯定會士

在奧斯定會士中，宜提出聖奧熱果(San Alonso Orozco, 1500~1591)。他被任命為王室講道，並建立不少修院，寫了很多作品，其中有一本《論基督的九個名字》(*De nueve Nombres de Cristo*)，可以是其同會弟兄良路易修士(Fray Luis de León)之著名作品的前驅。

## 3. 耶穌會

耶穌會的成立雖屬此段時期，但卻不是在西班牙創會。首批的五位會士均為西班牙人，其中羅耀拉·依納爵(Ignacio Loyola, 1542~1556)、方濟·沙威(Francisco Javier, 1506~1552)、雷奈斯(Diego

---

<sup>20</sup> Manuel de Castro, OFM, s.v. Osuna. Francisco de, en Q. Aldea (dir.), *Diccionario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 de España*, III, Madrid 1973, 1850~1851. <http://franciscanos.org/enciclopedia/franciscoosuna.htm>

<sup>21</sup> Pedro de Alcántara Martínez, OFM, s.v. Osuna, Francisco de, en *Gran Enciclopedia Rialp*. Tomo XVII. Madrid, Ed. Rialp, 1973, p. 515 (同上)。

Lainez, 1512~1565)、薩耳梅龍 (Alfonso Salmerón, 1515~1585) 都相當顯著。而雷奈斯、薩耳梅龍是特利騰大公會議中赫赫有名的神學家：特別是藉著《神操》使西班牙宗教經驗加深許多；同樣的，方濟·沙威自東方寄來的信，吸引多人進入各個修會，以給新接觸的民族宣講福音。

#### 4. 教區神父

最著名的，是最近被教會封為聖師的亞味拉的聖若望 (San Juan de Avila)，他寫一本談論聖詠的書《女兒，請聽》，和為了各種生活狀況的信函，將之集結成書： *Epistolario espiritual para todos los estados*。

#### (八) 在美洲宣講福音

「科提斯 (Hernán Cortés de Monroy y Pizarro, 1485~1547) 寫給皇帝卡羅斯的第三封信，於 1522 年抵達，請求皇帝派遣更多的教士到新西班牙 (即現今的墨西哥)。」

「除了要求教會的幫忙外，另附上一封由他個人、教士 Pedro Melgarejo 及總務 Aldrete 所署名的信，懇求國王多差遣主教們及所有修會的會士，他們應具有良好的生活榜樣及美好的道理，為協助我們在這些地方更完整地培植健全的大公信仰……。」

那封信以很明智的話作結語：「我們求您不要委派自誇博學之士，因為他們一進到我們這個地方，會使這裡全部混亂了！」

(胡托馬 56~57)。

「1524 年初，另十二位方濟會士前往新西班牙。這些卓越的人……赤足從 Veracruz 走到墨西哥的 Tenochtitlán。他們不是一般的方濟會士，而是屬於嚴格的加伯爾會省。」

（胡托馬 59）

我多次引述這位作者，因為他是一位不受教會約束的歷史學者，看他如何理解、如何透過文字敘述，可反映出修會改革的效果及福傳的精神。這位作者也讓我們一窺西班牙人在那個時代的宗教感：「那些方濟各會士首先抵達 Tlaxcala，然後在六月中旬到了墨西哥，受到科提斯的接待。他們一到，科提斯就跪在其面前。目睹這態度，讓擔任舊墨西哥的領導者印象深刻」（胡托馬 61）。到了皇帝謝世時，墨西哥已有六個教區。

作為福傳的一部分，我們不能不提到修會在捍衛印地安人的自由、尊嚴與能力的努力。他們建立機構，教導各種職業培訓，也成立學校教拉丁文文法：「1538 年，Zumárraga 主教寫道：我已經有了六百位青年能靈活運用拉丁文法，而且他們的文法比我的好，可是印第安人一般不打算當神父，因為他們不願意放棄婚姻」（胡托馬 527）。我們也記得在西班牙，曾在皇帝的要求下討論「征服」這主題及其合法性。比較著名的是 Francisco de Vitoria 神父，他雖未出版任何書籍，卻在授課筆記中留下其思想：不過他的思想都呈現在他的授課及筆記中出版的 *De Indiis et de jure belli relectiones*。

### (九) 皇帝晚年的封閉態度

我們已見到，1527 年有高層聚會討論伊拉斯穆斯的正統性，而在此時，已經頒布了第一道反對光覺主義的法令。自從個性寧靜和諧的伊拉斯穆斯主義者曼黎加主教 (Alonso Manrique de Lara) 退下宗教裁判所審判官的職位以後，宗教裁判所愈來愈活躍地監控任何引起懷疑的運動。

「卡羅斯一世退位後，便退避到 Yuste 會院。他寫信給代替斐理伯王子 (Felipe) 攝政的若望夫人 (Juana)：應該毫不留情地壓迫與嚴厲懲罰，這正說明當時生活中惶惶不安的氣氛。」 (Notas)<sup>22</sup>

### 三、世紀的後半葉：斐理伯二世 (Felipe II) 的統治

我們可用一位教會史學家論及整個教會所說的話來說明：「在西班牙的特利騰改革，不只是單純地回到中古時代，而幾乎是在每個層面上的表達，都具有與新教對立的特色。教會從對自我身分的肯定，汲取自我革新和鞏固的力量」 (Jedin 695)。

#### (一) 斐理伯二世統治的開始，和中古時代的結束

斐理伯二世並未自動繼承父親的所有土地，卡羅斯皇帝決

---

<sup>22</sup> Antonio Irigoyen López y José Jesús García Hourcade *Notas para un Análisis de la Problemática Religiosa en la España de Felipe II*. El presente trabajo forma parte de un Proyecto de Investigación sobre el Concilio de Trento financiado por l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Murcia. <http://www.hottopos.com/mirand12/antjos.htm> (本文簡稱 Notas)。

定把帝國讓位給自己的兄弟費南度（Fernando I de Habsburgo, 1503~1564），同時把其它的土地轉給斐理伯二世。意思是：斐理伯二世在歐洲的參與是比較少且是間接的，直接管理的只有尼德蘭（現在的比利時和荷蘭）；並且，他與法國經常發生摩擦，除了一小段太平時光使他與英國聯姻，及英國「無敵艦隊」<sup>23</sup>的干預外。卡羅斯皇帝經常長期旅行而不在西班牙，斐理伯二世則正相反，幾乎沒離開過伊比利半島。關於卡羅斯，人們不知道他是中古時代最後一位皇帝，或是新時代的第一個國王，可能兩者皆是，猶如世代的橋樑。

的確，在這世紀的第二階段，可說已結束了中古時代之「基督徒共和國」的理想，即由一位皇帝來領導整個帝國，直到卡羅斯一世。猶如一位詩人曾寫道：「一位國王，一把劍，一個帝國」，正表達出活出來的政治理想。

## （二）西班牙的鎖國政策

斐理伯二世一直「居住」在西班牙，象徵其鎖國政策的過程：「斐理伯二世所參與之反改革與政治保護，導致十六世紀後半的西班牙文藝復興文化，有很明顯的宗教和國家特色」；結果是：「在皇帝時代所主導之某些歐洲的影響力消失了，就像伊拉斯穆斯主義……。文藝復興之第二階段的嚴肅面貌，表達在文學、藝術，甚至於社會和宮廷上」<sup>24</sup>。

<sup>23</sup> 雖然這名字變得最普遍，原本的名字是「巨大與最幸福的艦隊」。

<sup>24</sup> José García López,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Barcelona:



### (三) 教會從對自我身分的肯定汲取自我革新和鞏固的力量

#### 1. 神學的革新

神學的革新主要是方濟·維多 (Francisco de Vitoria, 1483-1546) 的貢獻，特別是在撒拉曼加大學。「阿卡拉首先影響了年老的撒拉曼加，鼓舞她；可是到最後，是撒拉曼加提出決定性的表達」。對於新理想的因素，Vitoria 提出下述三點 (HIC GV 634-35)：

- (1) 面對學派的宗派主義，保持獨立的態度。
- (2) 用聖多瑪斯的《神學大全》來代替彼得·隆巴 (Petrus Lombardus, 1100-1160) 的《四部語錄》 (*Sententiarum Libri Quattuor*) 當作基本教材。
- (3) 回到源頭：聖經、教父、大公會議文獻、教會文件...等。

透過特利騰大公會議，神學的改變影響到整個教會，可惜維多自己因年齡太大而無法參加，但其思想卻啓發了他的同事和學生們，例如道明會士 Domingo y Pedro de Soto, Melchor Cano、方濟會士 Alfonso de Castro 也屬於撒拉曼加大學：前面已提過耶穌會士雷奈斯和薩耳梅龍：還應加上「為數眾多的西班牙人 (主教) 和榮休的主教們 (Astorga, Calahorra Badajoz)」 (Jedin 641)。這是在第一會期。到了開大會時，Llorca 列出一長串著名主教的名單：Pachecho, Pedro Guerrero, Martín López de Ayala, Antonio Agustín, Andrés Cuesta, Antonio Carroñero, Francisco Blanco... (參：HIC BLI 816)。

## 2. 各個修會：改革與成果

- (1) 方濟會：方濟家庭有了新的革新，是從聖伯鐸·亞甘大（S. Pedro de Alcántara, 1499~1562）開始，拓展到整個西班牙及其殖民屬地（HIC BL816）。
- (2) 聖三會：聖若望·鞏西翁（San Juan Bautista de la Concepción, 1561~1613）在本世紀的後半葉實踐了聖三會的改革，由教宗克雷孟八世（Clemens VIII）於 1599 年授權。他在 Valdepeñas 建立了第一座「赤足聖三會院」，是目前僅存的一支<sup>25</sup>。
- (3) 聖衣會：聖衣會的改革碰觸到這次研討會的主題。聖女大德蘭於 1562 年在亞味拉（Avila）開始，其改革於 1568 年拓展到男修會，藉著聖十字若望在 Duruelo 建立修院。他在前一年遇到大德蘭，接受了她革新的理想。聖女那時已有總會長的許可，包括建立兩座男修會的會院，為幫助願意參與改革的男會士。教會革新在西班牙已持續近一個世紀，這兩位是這修院革新所產生的聖德卓越果實，其著作也因內容深奧與文學表達優美而聞名。
- (4) 奧斯定會：十六世紀後半葉天主教的革新，誕生了「重整奧斯定會」（Agustinos Recoletos）。1588 年 12 月，卡斯提亞會省的會士表達希望過比較儉樸成全的生活。這種「生活方式」由路易·里昂神父編寫，1589 年 9 月獲得

<sup>25</sup> [http://es.wikipedia.org/wiki/Orden\\_Trinitaria](http://es.wikipedia.org/wiki/Orden_Trinitaria)

省會批准，八年後獲得宗座的批准。十四章的內容具體表達默觀與團體生活之成全的深度渴望，強調奉獻生活的克修精神，於 1589 年在 Talavera de la Reina 會院開始試用<sup>26</sup>。

他們當中也出現具有文學價值的靈修作品，例如馬龍（Malón de Chaide, 1530~1589）的著作《瑪達肋納的悔改》。然而，主要人物仍是路易·里昂神父，他可說是文藝復興晚期的人文主義者：「在 1556~1557 年間，他接觸到一位研究中東文學的學者，也在阿卡拉教聖經的老師 Fray Cipriano de la Huerga。與他的相遇，為路易·里昂的思想培育是極重要的經驗」<sup>27</sup>。除了他自己的作品，本身就是文藝復興運動第二階段的經典之作且富有宗教精神之外，他協助聖女大德蘭的作品出版，也擁有很大的影響。

- (5) 道明會：既然談到文學著作，也應提到一位道明會士路易·格拉那達（Fray Luis de Granada, 1505~1588），他長期生活在葡萄牙，也在那裡完成大部分的作品。他是一位真正的宣道家，很有口才，也寫了許多靈修書籍，例如《祈禱與默想》（*Oración y meditación*）和《罪人指南》（*Guía de pecadores*）。

---

<sup>26</sup> [http://es.wikipedia.org/wiki/Orden\\_de\\_Agustinos\\_Recoletos](http://es.wikipedia.org/wiki/Orden_de_Agustinos_Recoletos)

<sup>27</sup> [http://es.wikipedia.org/wiki/Fray\\_Luis\\_de\\_Le%C3%B3n](http://es.wikipedia.org/wiki/Fray_Luis_de_Le%C3%B3n)（本文簡稱 León）。

### 3. 特利騰大公會議：教宗的推動、王室的接納和主教的角色

特利騰大公會議文獻標題 5.2，在西班牙的特利騰革新：王室和主教，經 Irigoyen 和 García Hourcade 綜合其在西班牙的應用如下：

「宗座和王室既存的差異，也可看出雙方對特利騰大公會議有不同的看法。雖然應該承認宗座的領導及義大利和法國代表的貢獻，但是不可懷疑的，爲了完成特利騰大公會議且有某種成功，斐理伯二世的貢獻最大。西班牙的與會代表，在質與量都具有很重的份量，連教廷也承認，因爲教宗碧岳四世 (Pio IV) 所派遣的 14 位神學家中，11 位是西班牙人，甚至最影響特利騰大公會議的神學家就是耶穌會的雷奈斯。

可是，斐理伯一世想要大公會議批准天主教王室所修改的政策，沒有成功。雖然他未獲所願，但他也不願意表現他輸了。因此，由於特利騰大公會議的改革，其應用需要得到國王和其教會諮議會的批准；故斐理伯二世頒布了大公法令須在不影響王室權利和特權的條件之下應用。

大公改革的應用，是在主教的手中；這一點，教宗和國王都同意。雖然主教們受到特利騰大公會議的支持，在地方上爲教宗的代表而擁有相當大的權力，由於從 1523 年以來的王室庇護，主教的任命在天主教王室手中。因此，主教變成斐理伯二世宗教政治的重要工具。應留意的是，主教們除了宗教的權力，在地方上也是國王的代表，在王

室於伊比利半島鞏固其王權的時代，這是他們的基本使命。」 (Notas 10)

#### 4. 在美洲宣講福音

這真是一個偉大的事工，主要是由修會來實踐，依據他們抵達美洲的時間排序，主要包括：方濟會、道明會、仁慈聖母會、奧斯定會和耶穌會；也有別的修會，但人數比較少。我們僅舉出幾個例子來看他們的工作和發展。

「在這世紀末，墨西哥有五個方濟會省和三個道明會省。這證明他們以怎樣的魄力開始這事工，和那個國家所給的回應。……傳教的教會所從事的多元服事令人稱羨，包括在秘魯的利馬大學 (1553 年)，即在昔日的印加王國內，直到在厄瓜多爾和巴拉圭的村莊<sup>28</sup>，在那裡的印地安人接受職業的系統培育，也保護他們免受白人的負面影響。」

(NHE14-15)

仁慈聖母會的會士從傳教的開始就有參與。依據他們的文獻，很可能在哥倫布第二次航行時，已帶了兩位仁慈聖母會的神父前往。無論如何，這是第三個以團體方式答覆傳福音的召叫。在十六世紀中葉，已經開始「第二個階段，含括 13 年，從 1561 年開始，由於在美洲的仁慈聖母會會士的要求，雖然他們幾乎都在西班牙出生和受培育，開始辦理會省獨立，為與卡斯提亞省分開。自 1556 年開始，於 1563 年首次決定性地建立四

---

<sup>28</sup> 類似「教會」電影裡所描寫的村落。

個美洲會省，包括科斯科（Cuzco）、利馬、瓜地馬拉和智利，而卡斯提亞的省會長則藉由巡視者和改革者，仍執行其功能」<sup>29</sup>。

很明顯地，這福傳事工對於西班牙也帶來迴響與激勵，畢竟是從這裡遣發人力，而充沛的聖召也是這國家宗教熱誠的一項指標。我們以一些數據來結束這一段：「在十六世紀末（於1591年的人力調查），獻身生活者的人力包括：教區神職人員 33,087人、男修會會士 20,697人、修女 20,369人，共 74,153人」（胡托馬 609）。

## 5. 特利騰的改革——表現出與新教對立的面貌

### (1) 懷疑的氣氛

反對新教的特徵之一，是懷疑。西班牙當時生活在這種氣氛下，甚至影響到一些重量級的人物，如路易·里昂神父：

「修會之間的嫉妒和爭吵，再加上希臘文教授的控告，將路易神父陷於宗教裁判所的監獄中，控告他較喜愛舊約的希伯來經文，勝過熱羅尼莫（Jerome, 約 347-420）所翻譯且由特利騰大公會議所採用的《拉丁通俗譯本》。這件事好像是真的，他也翻譯了某部分的聖經，具體來說，即《雅歌》，譯為一般人可讀的語言，這又是特利騰大公會議所明令禁止的，大公會議只允許釋義……。對於這樣的指控，雖然他是無辜的，其冗長的辯護使審判的過程持續

<sup>29</sup> <http://www.merced.org.ar/Biblioteca%20Virtual%20Mercedaria/Mercedarios%20en%20la%20Argentina/Mercar-1.htm>

了五年之久，最後得到平反。」(León)

作者提到的一些個人爭吵，可能是重要的一部分<sup>30</sup>，但是其背景，應是當時過分謹慎嚴格地解釋特利騰大公會議中，關於翻譯聖經與拉丁文通俗譯本的相關規定。

儘管如此，他一離開監獄，立即獲得撒拉曼加大學聖經教授的教席，依靠這權威，他為聖女大德蘭的著作寫了《辯護》，其中包含這行具有啓發性的句子：「有些人認為不應該唸她的著作，而提出三個理由：第一，因為她的著作教導所謂結合的祈禱，他們說不應該教導它，卻沒有說為什麼」<sup>31</sup>。

另一位是道明會士路易·格拉那達 (Fray Luis de Granada)，他的兩本書《祈禱與默想》和《罪人指南》也被列入禁書名單(瓦亞多利，1559年)。道明會士狄安納 (Desiderio Diez de Triana) 在路易神父著作選集的序文中試圖解釋：「那是一段混亂的時期，基督徒受到新教異端的分裂.....，每天都發現一個光覺者的會眾。面對前線的新教，與在家中的光覺者，神學家和審判官員的生活正焦頭爛額.....」<sup>32</sup>。

---

<sup>30</sup> 他一離開監獄，或仍在監禁的斗室所寫的十行詩，提到：「在這裡，忌妒與謊言囚禁了我.....」好像是真的。比較難證實的是另一名句：「我們昨天說到.....」，傳統說他有一天回到大學上課時，是以這句話開始的。

<sup>31</sup> Fray Luis de León, *Obras completas castellanas*, Madrid: B.A.C., MCMLI, p.1321.

<sup>32</sup> Fray Luis de Granada, *Obra selecta*, Madrid: B.A.C., MCMLII, pp.XXXVII~XXXVIII.

我們可以從這兩個例子看出，在「士林神學家」與「人文主義者」之間，仍有持續的對立。

## (2) 宗教的表現：一種外在的宗教虔誠

「特利騰大公會議的信徒，包括幾個非常具體的特徵：應該受洗；遵守宣信的規定；每年領聖體；奉獻十分之一和初果；順服於司鐸的講道；恭敬聖體聖事和聖母，特別是無染原罪和玫瑰經聖母；應是慈善的，且特別照顧卑微弱小；參與堂區或修院的各種善會，特別是與聖週有關的事務。」

「藉由把聖體聖事保留在祭台上，本堂被確認為天主具體駐留之地，後來變成唯一可以接受神聖敬禮的地方，其角色和重要性獲得極大的進展，毫無疑義地，堂區善會與民間敬禮亦然。有些資料可以證實，總而言之，在斐理伯二世去世時，個人靈修已所剩無幾。」（Notas 11~12）

藉著行爲、禮儀和上述提出的種種細節，其表現於外表的宗教虔誠，乃是明顯的標記。不難看出，這裡所強調的事實，正是新教所否定的（參：HIC BLI 1049~50）。

## (3) 文學與藝術

我們前面已提到從宗教所產生的文學，現在要對戲劇說幾句話，而其文學形式是更爲「外在的」。從中古時期保留的戲劇，大都是宗教主題，於十六世紀中葉已逐漸式微，但是在本世紀末，則因著特利騰大公會議的影響而再度復興。不少戲劇的主



題與聖體奧蹟有關，於下一世紀達到高峰。另一個經常出現的主題，是聖人的生平故事。

最後，關於藝術，特別要強調雕塑和繪畫，在實用與教育方面有較大的可能性。「自從Berruguete和Juan de Juni採用文藝復興的形式，適用於宗教主題並配合西班牙人的一般喜好，本世紀最後的三十年都維持這種風格，一直到完全與巴洛克藝術接軌」<sup>33</sup>。在宗教繪畫方面，也投入這些主題，我們可以提到Luis Morales (1509~1586)，而最重要的人物是一位生於西班牙之外、卻在西班牙成長的畫家艾爾·葛雷格 (El Greco, 1541~1614; Enrique Valdearcos 12; 14; 15~41)。

<sup>33</sup>

<http://clio.rediris.es/n33/n33/arte/21Renaesp.pdf>